

汤一介先生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杨立华 苑天舒 李 震

面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有传承和创新的巨大任务，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得以全面实现，这样中华民族将对人类做出史无前例的重大贡献。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如何传承创新儒学，也需要考虑如何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这就涉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事关重要的大事。^[1]

在2012年第4期《中国哲学史》上，汤一介先生发表过一篇论文：《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在这篇论文里，汤先生论述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在文化自身的传承创新中来实现。汤先生认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传承’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来‘创新’”^[2]。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汤先生一直关注的大问题。先生的相关论述甚多，但大都散见于他的各种著述当中。我们这里将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论述整理成文，希望能够呈现出其思想的整体脉络。

[1] 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2] 汤一介：《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汤一介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页。原载《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

一、中国文化的特质

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传统中，儒学或以儒学为主干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在民族心理的塑造与养成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积淀。着眼于此，汤一介先生充分肯定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对待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着一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人们总希望比较简单明确地提出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好的，是对我们今天甚至将来有用和有利的，哪些是坏的，是对我们今天无用和不利的。但事情也许并非如此，而常常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优点与缺点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并不能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直接就拿来为现代文化所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曾经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性。这种心理特性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即使今天，它仍然在不少方面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而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状态，它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所在，也表现了它的缺点所在。^[1]

认识传统文化，重在把握其核心特质。汤一介先生指出：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凝聚成的曾长期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大体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2]

以上四个方面，是汤一介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定位。汤先生的上述结论，既得自对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研究，又贯穿在其关于中外文化和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比思考之中。这里，我们以理想主义和辩证思维为例，对汤先生的分析略作介绍。

先看理想主义。汤先生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一文中，以儒家的道德与政治理论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气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理想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孔子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追求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理想政治。后来儒家把它发展成一套‘大同世界’的理想，并要求通过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这一

[1] 汤一介：《“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结合》，《汤一介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2] 同[1]。

理想。”^[1]“儒家哲学中的主要哲学家大都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积极的热诚的态度，企图用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大同’或‘致太平’的思想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一种理想。”^[2]

再看辩证思维。汤先生论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四个方面时说：“儒家哲学中的重要哲学家（除个别外）大都把建立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往往以矛盾的调和为终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注重一对概念的统一关系或诸种概念的相互关系。《易经》系统以乾、坤（后来以阴、阳）为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而《洪范》则以五行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立论。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和‘人’作为一对哲学概念提出后，儒家较多地注重‘天’和‘人’的统一的一面。”^[3]

二、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汤一介先生论中国文化之特质，其着眼点并不局限于中国固有文化自身，而是要在中外比较的宏观视野下探寻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化是为了使西方文化健全，中国人研究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同样的为了使中国文化健全。汤先生说：“西方研究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是认为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他的着眼点不是说将来要以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其目的是想使西方文化将来更健全。”^[4]汤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特别关注的，因此对于我们自己文化的问题就极为重视，他在讲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性”时，就讲到“内在超越不大会建立起客观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在讲“普遍和谐”时，也讲到“和谐的观念不经过分化就导致不能发展出科学、系统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来”。^[5]

在外来文化中，汤先生对于发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了特别关注。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而是被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纵观当今世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也没有继续发展，甚至出现了某些停滞。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比较成功

[1] 汤一介：《“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结合》，《汤一介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 汤一介：《论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汤一介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3] 同[2]，第45页。

[4] 汤一介：《我的哲学之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5] 同[4]。

的，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今天，中国又创新发展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反而能够在中国得到发展呢？这个问题可以从汤一介先生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上的异地发展和单向流动理论中找到答案。

汤先生说：“一种文化在一地（或一民族）发展日久或遇到某种特殊的原因，会出现某种衰退甚至断绝的现象，而往往会在其传到另一地区（或民族）得到发展，例如佛教在印度流传到七、八世纪，以后没有什么重大发展，但佛教在中国隋唐时期（七、八、九世纪），由于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而为中国的高僧大德所发展，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并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所以我曾经说：‘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这种文化的异地发展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亚洲，而且也发生在欧洲。如前引罗素所说，今日欧洲的文化是由埃及而到希腊，中经罗马、阿拉伯再回到欧洲，正是这种文化的异地发展，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究其原因，甲种文化移植到乙种文化中往往会为甲种文化增加某些新因素，这些新因素或者是甲种文化原来没有的，或者是在甲种文化中没有发展的，它们的加入使甲种文化在乙种文化中得到了发展。”^[1]马克思主义就是进入中国的“甲种文化”，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与它互补的思想价值使其得到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找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补性，可以帮助儒学纠正对经济基础和法治的忽视，这样如同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带来宋明理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将会带动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

汤一介先生始终关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细化的过程。

在198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一介先生作了题为《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并在发言之后的讨论中谈到了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从当时参加会议的刘述先教授所撰写的《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纪行》一文中看到：

汤一介讲完之后，在讨论时间，冯沪祥（台湾）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问他

[1] 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所讲的这一套究竟与马克思主义有怎样的关联。汤一介的答复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之间至少可以看出三点契合之处：(a) 二者都重实践；(b) 二者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c) 马克思主义有所谓矛盾统一律，过去过分强调斗争，以至产生偏向，如今应该强调和谐，乃和儒家有互相契合之处。沪祥自不满意，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理想与实践同儒家在实质上完全不同，似难加以牵合。一介又多方解释，都难令沪祥满意。但双方态度平和，绝无剑拔弩张姿态。而沪祥在日前宣读论文批评新马克思主义之余，在答复（杜）维明询问时，曾肯定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无可避免的。^[1]

之所以会有上面记述的这个讨论，是因为1983年中国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久，汤一介先生作为从中国大陆出国去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学者，而且在这次世界哲学大会上的发言又是探讨儒家思想有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让海外学者感觉有点惊奇。根据刘述先教授的记述，汤先生的发言出现了会议的最高潮，“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2]

在大会上，汤先生谈到的主要是实践、理想主义与统一这三点，对应于前引论中国文化特质中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辩证思维三部分。在这次会议之后过了将近三十年，儒家人本主义思想中对于人的观点，在汤先生论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时被作为第四个“契合点”提出来。

汤先生提到：“在1983年，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年的夏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到21世纪初我主持编纂《儒藏》时，由于对于中国先秦的‘礼’有所涉及，又接触到先秦儒学如何处理‘人’的问题，我注意到儒学是从社会关系上定义‘人’。因此，可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至少有四个契合点。”^[3]汤先生所说的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契合点^[4]是：

(1)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

[1] 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73页。

[2] 同[1]。

[3] 汤一介：《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汤一介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287页。

[4] 同[3]。汤先生在阐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凝结成的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核心“四个方面”时，有时用“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想”“理性主义”，有时也用“空想的理想主义”、“实践的道德观念”、“求统一的思维方式”、“直观的理性主义”，这两种表述是一致的。参见汤一介：《论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汤一介集》（第5卷），第43页；汤一介：《“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结合》，《汤一介集》（第7卷），第15页。

- (2)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
- (3)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定义人；
- (4)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斗争与和谐的看法都是最终从斗争达到和谐。

汤先生的相关阐述，不是从一两个例子得出的，而是在对中国思想、哲学、文化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在论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取理想主义态度这个契合点时，汤先生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1]汤先生以《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为例指出：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上引《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是有某种契合之处的”。^[2]汤先生同时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的利益日益尖锐矛盾之时，所以它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发的，自然比大同思想更切合现代的实际”。^[3]理想主义这个契合点于是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找到了。

汤先生在论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斗争与和谐统一的看法存在契合之处时说：“《周易》是中国最古老讲事物发展变化的书，《系辞》中的‘太极生两仪’包含着‘一分为二’的因素。儒学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斗争，一味只讲和谐。”^[4]同时汤先生引用了张载的一段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5]，以此说明儒家思想是讲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其内部矛盾对立统一斗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是存在契合之处的。

汤先生阐述人本主义时认为，儒家哲学所具有的人本主义倾向与西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西方近世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都有区别。^[6]汤先生说：“中国过去社会里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加以考察。”^[7]汤先生在论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定义人这个契合点时，也从儒家的礼谈到了“先秦儒家不是从抽象的个人来定义人，而是从社会关系

[1] 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

[2] 同[1]，第144页。

[3] 同[2]。

[4] 同[1]，第146页。

[5] 同[4]。

[6] 汤一介：《论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汤一介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7] 同[6]，第43页。

来定义人”。^[1]汤先生引用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所说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汤先生分析说：“就理论上说，马克思当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较之儒家思想更深刻，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从思路上说，儒学关于礼的理念和马克思的思路是有一致之处的。”^[3]以此得出在关系中定义人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契合点。

汤先生在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的论述中说：“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有其比较完整的一套哲学体系，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儒学从《尚书·说命》起就讨论到知、行关系，认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召公十年》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一直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都重在知必须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革命的理论如果要实现改变世界，那就一定要见之于实践。”^[4]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性主义中，包含着知和行两个方面，而且是知行合一。换句话说，这种知行合一所表现出来的重视社会实践，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由此便推论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重实践的，都是实践的哲学”这一契合点。

汤先生说：

马克思主义应该可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能起积极作用的方面相结合，这点也许许多人可以同意的，但是如何结合则是个问题。关于如何结合的问题也许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考虑，例如，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些结合点，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中找到某些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用中国传统思想中今天有积极意义的方面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应深入研究，不是由一两个例证可以解决的，应该从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揭示其发展规律中找到如何结合的途径。由此，我们就必须对中国思想、哲学、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注：第三个问题即：怎样从总体上对待传统文化）^[5]

[1] 汤一介：《论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汤一介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2] 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

[3] 同[2]。

[4] 同[2]，第145页。

[5] 汤一介：《“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结合》，《汤一介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汤先生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凝聚成的曾长期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大体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1]这是汤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总体研究之后作出的总结。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实践、理想主义、求统一、在关系中定义“人”这四个契合点，是汤先生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凝聚而成的长期影响中华民族的核心四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得出的。汤先生在论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四个方面时也一一指出了其中的缺陷与问题，而这些不足之处的某些部分是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广泛的西方思想文化）中提取的思想价值来补充的，这种论述方式是非常细致全面的。

汤先生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四个方面，来自于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的深入研究与揭示，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做认真的比较，得到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契合点。因此，我们说汤先生指出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从一两个例子得出的，而是在对中国思想、哲学、文化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汤先生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契合点的阐述，着眼点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上的，也是着眼于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的民族心理特性上，所以说汤先生从这个地方入手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论述是非常深刻的。

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互补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有不足之处。分析研究它们之间所具有的互补性，能够实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汤先生在2012年《中国哲学史》第4期上发表了专题论文《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在这篇文章里汤先生说：“创建中国国学中心是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因此，它应该处理好‘国学’，主要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关于处理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之能共存共新，互利互补，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研究的大课题。”

事实上，汤先生在1986年已经在讨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提出要“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中找到某些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的方面来补充马克思主义”，^[2]来发展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

[1] 汤一介：“‘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结合”，《汤一介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2]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论中国传统文化》，《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互补之处，汤一介先生说：

也许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纠正：一是儒学必须特别重视“经济基础”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学是十分欠缺的。二是必须克服儒学过于重视“人治”，而忽视“法治”的缺点，也就是说要克服“道德至上主义”。“道德”对人生十分重要，但一个健全的社会是要由多方面来维系的，如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要由多方面共同协调发展的，不能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那么，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可补充和纠正之处呢？我认为，至少也有两点：一是“要重视传统”，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句话马、恩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们也许可以给以同情的理解，但是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来说是片面的。我想，这方面可以从儒学十分重视“传统”方面得到一些补充和纠正。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不多，但在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1]

具体说来，汤先生认为儒学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补充与纠正有两点：一是要重视传统；二是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共产党宣言》中讲：“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汤先生认为这句话马、恩在当时的情景下可以给以同情和理解，但是有其片面性的，“这方面可以从儒学十分重视传统方面得到一些补充和纠正”^[2]。再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对于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讨论的不多。相比而言，被马克思认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研究的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以前先将其所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讲义写成巨著《道德情操论》，而后利用同样这门“道德哲学”课程的讲义写成《国富论》，所以说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建立在道德伦理研究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对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讨论不多，这是其不足之处，这会不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出现了很多道德灾难的一个因素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至少应该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予以重视。汤一介先生说：对于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

[1] 汤一介：《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汤一介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287页。

[2] 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别丰富，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1]

汤先生认为儒学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两个方面的纠正：一是重视经济基础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学是十分欠缺的。二是克服儒学过于重视人治，而忽视法治的缺点，即克服道德至上主义。

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彼此有可以互补与纠正之处的研究，不仅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有帮助，对于清晰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应该意义更大。汤先生说：“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如何？我们可以说，它必定是一种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以有两种提法：一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2]汤先生认为这两种前景是一回事，他说：“这两种前景也许是一回事，也许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我相信它们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首先是中国的，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3]汤先生在这里所讲的是文化的双向选择问题。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它对外来文化总有某种抗拒性，因此，一般来说，外来文化首先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依附于原有文化。^[4]但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似乎不是这样，而是对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进来的（或许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可以看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当这种冲击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的时候，原有文化的反抗也就开始显现了。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是在反传统，但是文化热所反的这个传统是“几十年来形成的极‘左’的教条主义的新传统。而且，反对几十年来形成的极‘左’教条主义新传统，也正是为了保护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中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5]。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似乎就是极“左”的新传统。当文化热过后，上世纪90年代又开始了国学热，这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而来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醒觉，中国传统文化又一次比较有力量地开始回应过去一百多年来所谓的全盘西化的冲击。此时无论之前进来的各种西方思潮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受到了国学热某种意义上的挑战。

对于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回答，汤先生也

[1] 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2] 汤一介：《“论中国传统文化”序》，《汤一介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3] 同[2]。

[4] 汤一介：《文化的双向选择》，《汤一介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5] 汤一介：《“文化热”与“国学热”》，《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

有自己的深入思考。汤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新文化应该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汤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的新文化毕竟是要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建设，因此它总是中国的，总应有中国的特点。”^[1]所以现在看到把原来的有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改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汤先生所讲的是一致的，后者强调了“中国的”这一概念，这一点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同。当然，正如汤先生所说：外来文化“其中与原有文化相近的部分比较容易传播，然后不同的部分渐渐渗透到原有文化中起作用，而对原有文化发生影响”。^[2]

汤先生在《儒学与外来文化的传入》中说：“任何悠久且仍然有着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必有其发生发展的源头，也就是说其发源地，它可被称为该民族文化之‘源’。……在这些有长久历史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吸收着其他地区民族文化以滋养其身，而被吸收的种种文化对吸收方来说则是‘流’。一个有长久历史仍然有着生命力的文化就像一条不断流着的大江大河，它必有一个源头，它在流动之中往往会有一些江河汇入，这些汇入主干流的江河常被称为‘支流’，甚至某些支流在一定情况下其流量比来自源头的流量还要大，但‘源’仍然是‘源’，‘流’仍然是‘流’。因此，我们在讨论一种文化的发展时必须注意处理好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3]从汤先生这段话来看，就中国文化自身发展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源，而马克思主义是汇入中国文化主干的流。汤先生在一次采访中也谈到文化的源和流的问题：“我有这样一种观点，文化有个源和流的关系。……西汉末年东汉时佛教传进来了，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很大，使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扩展。……最后是佛教中国化了，变成了中国的东西了，佛教是流而不是源。佛教现在就是中国的佛教……当今，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来讲依然是流而不是源，我们应该把它们融合到中国文化中来，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原来是儒释道三家，现在是儒释道马（克思）四家，需要研究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共同地融合成中国文化，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4]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在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三者间不是简单平列关系，而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融会“中西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此，我

[1] 汤一介：《文化的双向选择》，《汤一介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2] 同[1]。

[3] 汤一介：《儒学与外来文化的传入》，《汤一介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4] 汤一介：《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汤一介集》（第10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

想起了汤一介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政治上可以有指导思想，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如果有指导思想就没有办法发展学术了。”^[1]作为学术研究是不应该有前提预设和思想框架的，那样会限制自由思考。如果在研究之前就先设置了各种框框，那么就没有办法保证学术研究向真理靠近。

找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点与互补之处，让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是汤先生论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重心所在。

[1] 汤一介：“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汤一介集》（第10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页。